

議題四 綜合討論

台灣金融機制 何去何從

● 當務之急走向國際

● 金控好不好，不在大或小

● 政府應捨棄控制銀行的思維

● 政府不該管銀行的規模

● 論公與義，公股權益保障列首位

主持人 許嘉棟（中央信託局董事長、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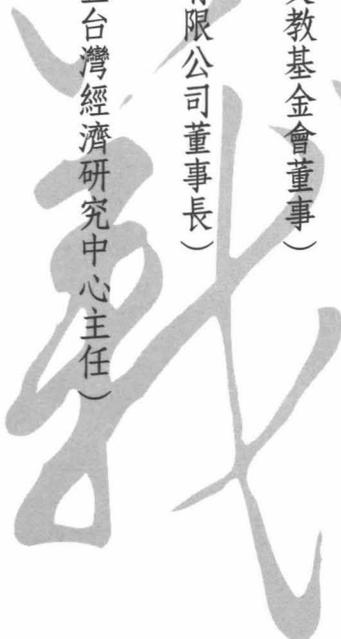
與談人 朱敬一（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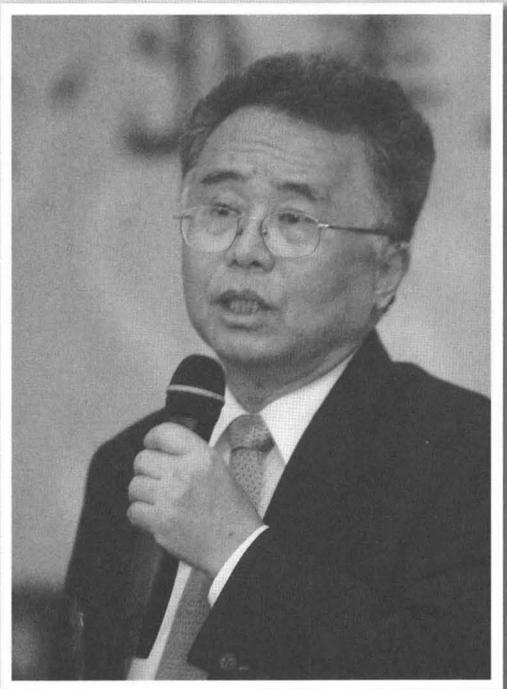
邱正雄（安泰商業銀行董事長）

林全（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）

薛琦（台灣金融研訓院長）

朱雲鵬（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台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）





主持人

許嘉棟

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。現任中央信託局董事長。專業領域為貨幣金融，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暨所長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、中央銀行副總裁、財政部部長、外貿協會董事長。

朱敬一

美國密西根大學ANN ARBOR 經濟學博士。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專業領域為人口經濟、法律經濟、財政學，代表著作有《經濟學的視野》、《聯經》、《基本人權》時報、《Population Dynamics》(Oxford University Press) 等專書，論文計百餘種，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。





與談人

邱正雄

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博士。現任安泰商業銀行董事長。專業領域為財政與金融政策、經濟發展。代表著作有《台灣當前金融問題與挑戰——透明化、紀律化與健全化》，載於李紀珠編《台灣金融改革之路》，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。《一九八五至二〇〇〇年間台灣的政策、金融與經濟成長》，淡江大學亞太社會科技學報，第二卷第一期。

林全

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經濟學博士。現任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。專業領域為財經，曾任財政部部長、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、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暨財政研究所教授、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、政治大學財稅學系系主任、財政研究所所長、政治大學財稅學系暨財政研究所教授、政治大學財稅學系暨財政研究所副教授、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。





與談人

薛琦

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經濟學博士。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。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、產業經濟學、國際經濟學，曾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、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、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、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、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產業組副召集人、行政主計處國民所得評審委員會委員。

朱雲鵬

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。現任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台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。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、國際經濟學、一般均衡模型，近期著作有《金磚四國關鍵報告》（合著），商智文化、《永續台灣二〇一一》（合著），天下文化，曾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兼任研究員、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。



《與談》

當務之急走向國際

◎朱敬一

第一個我想談的是，今日的會議主題大概有三個大方面：一個是要追求效率，二是社會公平，三是走向國際。記得楊子江先生談到，他覺得這三項中走向國際是最重要的，他認為只有在走向國際的情境下，談效率才有意義。就好像學術一樣，有些東西是有本土概念的，像文化、教育；而有些東西比較沒有，像數學。所以拚到在哪一個縣市的數學第一名是沒有意義的。同樣地，在金融愈來愈國際化的情況下，要走出一個效率，就一定要在一個大一點的環境之下，也許一開始野心不需要太大，不需要到全世界的效率領先，但是絕對要在區域領先。我很同意楊子江先生的看法。

第二，也只有有國際的框架之下，市場的公平才能夠出現。在一個比較大的環境之

下，競爭出現，出頭了的公平是會比較有意義的。楊子江先生和計葵生先生昨天皆提到，若要討論國際化，就不能不看中國大陸，甚至東南亞。他們兩位的論點有二：一、台商在中國大陸所具備的相當優勢是不可否認的。二、計葵生先生提及全世界的客觀資料顯示，東南亞和亞洲是一個新興地區，隨其產業的蓬勃興盛，其金融市場就必然會蓬勃發展。因此，若要真正走向國際，不論任何政治等困難理由都不能迴避掉這一部分，不然國際化走不出去。第三，大家都提到，走向國際是不夠的，要提升銀行的金融的競爭效率和公司治理、銀行監理大有關連。在這兩方面，國內大概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以下就分幾個方向談。

坦白說，國內的銀行，絕大多數的私人銀行都有家族企業的文化，到現在為止都尚未真正地脫離家族的色彩，連專業經理人的地位都還不太能夠確立，更遑論公司治理了。這也是葉銀華教授所談到的「董事會的內部化」，若董事會中都是家族或其衍生的成員，則公司治理是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如果是要往公司治理的方向走，記得陳聖德先生曾提到過，目前國內的金控整併，金管會握有很大的權力，所有因擴張而增加的董事全部皆得為獨立董事，這不是涉及到制度的全面改變，是金管會可以用它的行政權做到的一個要求。我覺得它對於擴張地盤、金融併購、控股的擴張等等幾乎是必須要做的一个手段。如果連

這個手段都不做的話，那麼當一個有家族色彩的集團愈趨龐大時，而主管機構完全不做行政上的要求，社會可能不能接受，而日後為此付出的社會成本也會非常高。

第三，蔡副院長提到的也牽涉到國際化，她說要把目前國內落後的公司治理和銀行監理提升，有一個捷徑，即借重國外銀行的專業人才、制度標準等。國際化不但讓企業走向開放，也有助於國內銀行監理與公司治理的提升。

二次金改目標，不合經濟學原理

第四，最近銀行間的金融併購愈來愈大，我不認為二次金改往大方向一定是一個好的方向。沈中華教授提出很多的數據，有正有反。我覺得正、反不那麼重要。金融業變大了並非因為變大而成功，而是因為它事業做成功所以變大。其間的因果關係一定要搞清楚，而非用數據來合理化併購才能夠走向國際化。我覺得無法說服人。我教經濟學原理二十多年，我覺得如果真正相信二次金改的四個目標，你的經濟學原理是不會及格的。如果是基於種種限制，而不得不做些妥協那我還可以理解，但是若真正相信那四個目標是經濟學該走的方向，我覺得被當掉的機率很大。

社會公平的問題，我把它分成兩個方向看。我覺得社會的公平有兩種模式，一種是幾個大財團在競逐資源；在這個情況下，我覺得市場是非常重要的，亦即，市場是引導資源競逐最公平的一個手段。若資源競逐不要市場，那就是政治力進來了，政治力就會牽涉到和當權者之間的關係交易等猜測，為何當前的弊案會有這麼大的名分？因為大家都覺得不公平，若競逐資源是透過市場，大家就會覺得它是公平的。另外一種情況，不是競逐資源，而是牽涉到非常有權勢的一方欺負非常弱勢的一方，譬如假設真的有些人因為制度情況的不了解而做了卡奴，影響到其生計，變成弱的一方和強的一方不在一個平等的情況之下，而且影響到弱的那一方面的相當基本的權利，如果是這樣，市場就不是一個適合的解決辦法，就會需要一些別的保障去解決它。所以我認為，要談公不公平，我覺得看哪一種，若牽涉到弱勢的話，可能市場就不是一個很公平的機制。可是如果牽涉到資源分配，市場就是一個非常公平的機制。